

• 哲学传统研究 •

逻辑的名辩化及其成绩与问题

晋荣东

摘 要: 西方逻辑在传入中国之初曾经历了一个“逻辑名辩化”的过程,即用中国旧有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诠释传统逻辑的术语,以便后者更容易地为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所接受。尽管逻辑的名辩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了对中国古代名辩的研究,但其本身在总体上并未取得成功。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深入思考传统逻辑与名辩的关系、反思“名辩逻辑化”的理论得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逻辑;名辩;中国逻辑史

中图分类号: B81-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11)06-0053-17

西方逻辑在传入中国之初,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了一个笔者称之为“逻辑名辩化”的阶段。尽管中国逻辑史学界迄今对逻辑东渐的整个过程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对“逻辑名辩化”这一现象却鲜有论及。^① 鉴于此,本文的目的就是:一方面,通过对西方逻辑在近代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过程的简要梳理,以证成逻辑名辩化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通过介绍同时代学者对逻辑名辩化的若干质疑,来检讨逻辑名辩化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作者简介: 晋荣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重新审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0AZX002)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赵总宽主编:《逻辑学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宋文坚:《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郭桥:《逻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述诸书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分期对西方逻辑在近现代中国的传入与研究进行了梳理与研讨,但均未提及西方逻辑在其东渐过程中存在着“逻辑名辩化”这一阶段,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其历史进程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展开梳理与论说。

一、“逻辑”、“名辩”与“逻辑名辩化”

在对逻辑名辩化的历史进程展开梳理之前,有必要对跟其有关的三个关键词——“逻辑”、“名辩”与“逻辑名辩化”——的含义作一预备性的讨论。

尽管存在不同的理解,逻辑(logic)还是被普遍地视为一门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通过研究推理、论证的规则与规律来为人们正确思维和把握真理提供工具。基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或发展阶段等的不同,逻辑又有不同的理论形态,具体化为不同的分支学科。就本文的使用而言,“逻辑”一词主要指的是传统逻辑(traditional logic),即数理逻辑产生之前的逻辑,也就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历经中世纪与近代的演变而一直发展到19世纪的逻辑,具体包括古典的演绎逻辑,如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等,以及古典的归纳逻辑,如培根的“三表法”和探求因果联系的“穆勒五法”等。这种逻辑主要经由明末的西方传教士以及晚清的西学东渐运动传入中国。

“名辩”(Mingbian or the study of name and argumentation)一词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仅指先秦时期名家或辩者围绕名实、同异、坚白之争等论题及论辩之用途、方法、原则等问题而展开的辩论与研究,主要包括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和后期墨家的思想。^①在广义上看,“名辩”又泛指名家或辩者以外的先秦思想家,甚至是先秦以后的思想家,对“名”与“辩”所涉诸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与论说。^②例如,孔子的“正名”、老子的“无名”、庄子的“辩无胜”、荀子的《正名》、法家的“循名责实”、《吕氏春秋》的“正名审分”、魏晋玄学的“辩名析理”,等等,都属于广义“名辩”的所指范围。^③

所谓“逻辑名辩化”(the mingbianization of western logic),指的是逻辑东渐过程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即在诞生于西方的传统逻辑输入中国之初,译者和学者们往往试图援引本土文化来“规抚”外来文化,借助中国旧有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阐释传统逻辑的术语,使后者带上某种中国本土的色彩与特点,以便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普及和研究,更容易地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所接纳。

①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庞朴:《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参见郭沫若:《名辩思潮的批判》,载《十批判书》,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年版;周山:《智慧的欢歌——先秦名辩思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林铭均、曾祥云:《名辩学新探》,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对中国古代名辩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的较为全面的介绍,可参见周云之:《名辩学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刘培育:《中国名辩学》,载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8页。

二、作为明辩之道与名理探的 Logic

中国逻辑史学界通常认为,1631 年刻印的由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译义、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是西方逻辑输入中国的第一本译著。^①不过,“逻辑”一词在此之前其实已经传入中国。

现有资料表明,在刻印于 1620 年的《童幼教育》一书中,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已言及逻辑的学科性质及其在哲学中的地位:

费罗所非亚者,译言格物穷理之道也,名号最尊。……此道又分五家:一曰落热加,一曰非西加,一曰玛得玛弟加,一曰默大非西加,一曰厄第加。落热加者,译言明辩之道,以立诸学之根基,而贵辩是与非、实与虚、里与表,盖开茅塞而于事物之隐蕴,不使谬误也。^②

这段文字中出现的术语,其对应的拉丁原文和现在的通行译法,可列表如下:

拉丁语	高氏译名	现译名
philosophia	费罗所非亚	哲学
logica	落热加	逻辑
physica	非西加	物理学
mathematica	玛得玛弟加	数学
metaphysica	默大非西加	形而上学
ethic	厄第加	伦理学

1623 年,另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o)在《西学凡》中以近乎相同的文字重复了高一志对哲学以及逻辑的介绍。其中,“logica”被译作“落日加”,与“落热加”仅一字之别。^③

高、艾二人均以“明辩之道”释“logica”。在古汉语中,“辩”与“辨”往往相通。“明

① 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第 28 页;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资料编选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近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名理探〉出版说明》,载《名理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3 页。

② 高一志:《童幼教育》,载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 1996 年版,第 377-378 页。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考证,《童幼教育》于 1620 年已有刻本问世,参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与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95 页。

③ 艾儒略:《西学凡》,载李之藻编:《天学初函》(第一册),台北:学生书局 1966 年影印本,第 31-40 页。

辩”或“明辨”乃中国旧有语词,意指明显地区分开来。如《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韩非子·有度》:“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更为重要的是,逻辑所欲明辩的对象是“是与非、实与虚、里与表”,而这与后期墨家对“辩”的功能性定义颇为接近。按《小取》:“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尽管没有现存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高一志和艾儒略用“明辩之道”释“logica”的具体考量,不过在客观上,他们两人已经开启了逻辑名辩化的先河。

傅汎际和李之藻所译《名理探》,其底本是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ty of Coimbra)耶稣会士塞巴斯蒂安·科托(Sebastian Couto)所编撰的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et Societatis Jesu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亚里士多德论辩术评注》),出版于1606年,主要是对拉丁文的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选本进行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①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名理探》已刊印部分仅对应于原书的上册,主要涉及亚里士多德的谓词理论(“五公”)与范畴学说(“十伦”)。^②

据《名理探》:

名理之论,凡属两可者,西云第亚第勒加;凡属明确,不得不然者,西云络日伽。穷理者,兼用此名,以称推论之总艺云。依此释络日伽为名理探。即循所已明,推而通诸未明之辩也。^③

不难看出,“名理之论”或“名理探”实际上具有三重含义:其一是对翻译所依底本书名的意译。其二指一门包括“第亚第勒加”和“络日伽”在内的学问。前者是对“dialectica”的翻译,指与“两可”、不确定之域有关的论辩术;后者是对“logica”的翻译,指与“明确”、必然之域有关的逻辑。其三则指逻辑,研究如何从已知推出未知。另一方面,“logica”一词在此书中除了被音译为“络日伽”,还被意译为“名理之学”、“名理之论”、“名理探”、“推论之总艺”或“辩艺”。^④

① 参见 John P. Doyle, “Collegium Conimbricense”,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Craig, CD-ROM, Version 1.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Robert Wardy: *Aristotle in China: Language, Categories and Transl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5-76。日本学者深则助雄对《名理探》一书的翻译也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参见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十一章。

② 《名理探》译而未刻的部分,长期以来不知所终。经考证,一部分保存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所编《穷理学》的残卷之中。参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90-192页;张西平:《〈穷理学〉——南怀仁最重要的著作》,载《国际汉学》(第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393页。

③ 《名理探》,第15页。

④ “辩艺,西云络日伽。”参见《名理探》,第11页。

较之高一志、艾儒略等人对“logica”的翻译和理解,傅、李二人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译名选择,不仅有音译,还包括一些说明性的短语甚至是对等的名词。以“名理探”为例。“探”有探究之意,所探之对象为“名理”。“名理”也是中国旧有语词,始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名理》:“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循名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审察名理终始,是谓究理。”即应根据名号职分的意义来评价一个人的是非曲直。从广义名辩的角度看,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法家所主张的“循名责实”,即君王按臣下的官职名位来监督、考核其是否尽责。“审察名理”、“循名究理”在魏晋时期逐渐演变成为对抽象的人才标准和才性关系的讨论。才性之学注重辩名析理,故又被称为“名理之学”。《三国志·魏书·钟会传》:“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名理之学对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王弼、郭象等人在论学时都非常强调辩名析理。如王弼《老子指略》:“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由“循名责实”、“循名究理”发展而来的“辩名析理”,在此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具体人物的品评,而是强调通过思辩的概念分析与推论来为玄学提供论证。

《名理探》已刊印部分主要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谓词理论与范畴学说的评注来介绍一些与传统逻辑有关的基础性概念,这与魏晋时期“辩名析理”所突出的对概念进行思辩的分析,颇有几分相似。那么这种相似是否就是傅、李二人用“名理探”来翻译“logica”一词的考量所在呢?正如顾有信(Joachim Kurtz)所指出的,“因傅汎际和李之藻翻译名词的考量没有留下任何说明,所以无法确定他们采用‘名理’一词是否真想暗示欧洲逻辑和中国玄学的神似性,还是仅想借用中文本土名词来表达外来概念。”^① 尽管我们现在没有足够证据来确定他们两人是自觉地在“辩名析理”的意义上把“logica”译为“名理探”,但不可否认的是,用“名理”这个与本土名辩有关的语词来翻译和阐释“logica”,对后来的中国人理解逻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至 20 世纪上半叶,仍有不少学者以名理之学来诠释“逻辑”,如李杕译《名理学》、高儒的《名理通论》、景幼南的《名理新探》,等等。^② 其中,李杕以“辞”译“propositiones”(命题)、“推想”译“rationcinium”(推理)、“顺推”译“rationcinium deductum”(演绎)、“逆推”译“rationcinium inductum”(归纳),而“辞”、“推”等在词源上都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名辩。《名理新探》全书十四讲,包括“开宗”、“正名”、“辨句”、“推论”、“明辩”、“著书”和“正名示范”等部分,这也充分表现了作者以本土名辩的框架来讲解传统逻辑的努力。^③

① 顾有信:《语言接触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逻辑”中文译名源流再探讨》,载邹嘉彦、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4 页。

② 李杕译:《哲学提纲·名理学》,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1908 年版;高儒:《名理通论》,上海:开明书店 1929 年版;景幼南:《名理新探》,上海:正中书局 1947 年版。

③ “辞”、“推”、“辩”、“正名”等语词的名辩词源,详见后文对“辨学”、“名学”等译名的分析。

三、作为辨学的 Logic

在《名理探》于明末刻印之后,西方逻辑的传入一度中断,直至清末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才出现了西方逻辑的再度输入。^①

1886年,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翻译的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ovens)所著《辨学启蒙》(*Primer of Logic*)出版。^②不同于傅汎际和李之藻以“名理探”来称呼逻辑,艾约瑟以“辨学”译“logic”,用“辩论”、“论辨”、“议论”等翻译“reasoning”(推理),把“deductive reasoning”(演绎推理)和“inductive reasoning”(归纳推理)分别译为“凭理度物之分辨”和“即物察理之辨法”。据《辨学启蒙·序》:“首创辨学者,为希腊国阿利多低利。……劝人议事之舌辨学,并是卷分别妥否之论辨学,俱始编于彼也。”“舌辨学”现在通常译为“论辩术”,而“论辨学”之省称即是“辨学”。所谓“分别妥否”,就是对推理的好坏加以分别。据该书第三节:“辨学之谓,要即辨明辩论者善与不善之谓也。确能辨明何议论为善者,每使我明晓实事;何议论为不善者,每使人行入差谬途路至于无穷。”

事实上,“辩论”、“论辨”和“议论”等都不是艾约瑟新创制的语词。“辩论”与“论辨”,兼有辨析论说和辩驳争论二义。前一义,如《世说新语·言语》“德操曰”注引《司马徽别传》:“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后一义,如《汉书·严助传》:“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议论”一词首见于战国后期的《六韬·王翼》:“应偶宾客,议论谈话,消患解结。”意指对人或事物发表评论、意见。表示相同意思的还有“论议”一词,如《韩非子·八奸》:“人主者,固壅其言谈,希于听论议,易移以辩说。”与上述诸词含义相近的,尚有“辨说”、“辩说”、“辩议”等。如《荀子·非十二子》:“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

艾约瑟用“辨学”译“logic”,是否受到高一志、艾儒略以“明辩之道”释“logica”的影响,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辨学”一词亦非艾氏首创。据《宋史·王居正列传》:“以所论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于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学》。”此所谓“辨学”,指辨析不同观点之间的是非同异。又据唐代卢重玄注《列子》卷三:“子贡,辨学之士,进取

① 汪奠基曾提及乐溪学堂于1824年刊行过一本名叫《名学类通》的书,但译者佚名,原著者不详。该书并未收入梁启超于1896年编撰的《西学书目表》,汪氏本人也未说明他有关该书的信息究竟来自何处。参见《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6、436页。

② William Stanley Jovens, *Primer of Logic*,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6. 中国逻辑史学界通常认为,《辨学启蒙》由广学会刻印于1896年,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第128页。不过,此书实际上初版于1886年,署名“总税务司署印”。参见熊月之:《晚清逻辑学译介述论》,载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编:《西学东渐》(第三辑《西学东渐与文化自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3页。下引《辨学启蒙》,皆为总税务司署印本。

强学者也。”这里的“辩学”，则指富于才学而又善于辩论。

在艾氏所用译名中，“辨”或“辩”等语素均与中国本土的名辩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思想史上，后期墨家以对“辩”的系统研究而著称，论题涉及“辩”的基本功能、常见方法和主要原则等，其著作被后世称为《墨辩》；荀子深入讨论了“辩说”的性质、作用以及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区别了“圣人之辩”、“士君子之辩”与“小人之辩”。即便到了魏晋，注重辩名析理的才性之学对于“辩”亦有研究，刘劭就对“辩”的种类与基本原则进行过探讨。不过，作为“论辩学”的简称，“辨学”一词意指有关论辩或辩论之学，其含义也非“辨学”、“辩学”等语词的旧有用法所能范围。事实上，在艾约瑟之前，这两个语词的具体用法都与名辩传统没有直接的关系，迄今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在近代之前曾被用来指称中国古代围绕“名”与“辩”所涉诸问题而展开的辩论和研究。这就是说，现有的材料尚难以确定艾约瑟在翻译《辨学启蒙》时是在有意识地诉诸逻辑的名辩化来提高逻辑在中国社会的可接受程度。^①

在出版于 1896 年的《西学书目表》中，梁启超将《辨学启蒙》一书视为“无可归类之书”^②。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西方逻辑在晚清再度输入中国之初，它留给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印象仍然是一个外来的而且是完全陌生的学术领域。此时的梁启超尚不能把作为逻辑的辨学与中国旧有的名辩相对应，我们似乎更没有理由相信艾约瑟已经有意识地在运用中国旧有的名辩来传播西方逻辑。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尽管逻辑的名辩化是否为自觉之举尚难证明，艾约瑟在译介西方逻辑时的本土化尝试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用取材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例子对耶方斯原著中的不少例子进行了改写，以便陌生的逻辑能够更容易地为人们所接受。例如，他以“唐明皇”、“景教碑”和“泰山”为例来讲解表达单独概念之“专语”（专名），用“凡有巡抚衙门之城为省城，济南府有巡抚衙门，是以为省城”来讲“次第连成之论断语”（三段论）与“虚拟语句”（假言命题）的区别，等等。此外，艾氏还把原著中的公元纪年都转换成了中国的纪年，以方便中国读者的接受。

在逻辑东渐过程中，以“辨学”译“logic”的还有 1908 年出版的王国维译耶方斯的《辨学》（*Elementary Lessons of Logic: Deductive and Inductive*）。^③在这本书中，王国维除了把“logic”音译为“罗奇克”，使用更多的是“辨学”这一意译名词。此外，他还借用

① 用“辨学”（“辩学”）来称呼中国古代逻辑或者中国本土的名辩，都是这些语词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涌现出的新用法。这种新用法的出现，并非源于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既有用法，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因于艾约瑟以“辨学”译“logic”，以及“以新知附益旧学”，用西方逻辑来诠释中国本土的名辩。

② 参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载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44—1145 页。

③ William Stanley Jovens, *Elementary Lessons of Logic: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0; 耶方斯：《辨学》，王国维译，益森印刷局 1908 年版。据考证，张君劢（张立斋）已先于王国维在 1906 年将此书译成汉语，并以《耶方思氏论理学》为题于 1907 年在《学报》第 1—12 期连载发表。参见熊月之：《晚清逻辑学译介述论》，第 148—152 页。

了若干从词源上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名辩核心词汇的译名来翻译传统逻辑的基本术语(见下表)。

英语	王氏译名	现译名	名辩词源
logic	辨学	逻辑	辩/辨
term	名辞	词项	名
genus	类	属	类
inference	推论	推论	推
syllogism	推理式	三段论	
analogy	类推	类比	类/推
metaphor	譬喻	隐喻	譬/譬喻

就王氏译名的名辩词源看,后期墨家和荀子都提出了以“名”、“辞”、“说”、“辩”等为基本内容的名辩思想,强调在推理和论证中要“以类取”、“以类予”、“推类而不悖”。至于“推”,后期墨家不仅在《经下》中在一般推理的意义上使用过“推”:“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而推之”,而且在《小取》中专门论及了作为一种特殊的反驳方法的“推”:“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譬喻”也是传统名辩的关键词之一。《小取》把“譬”规定为“举他物而明之”,而据《潜夫论·释难》:“夫譬喻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

王国维本人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应该非常熟悉中国本土名辩的理论与历史,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采用传统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诠释西方传统逻辑的术语,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当然,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文本证据,王国维在翻译西方逻辑著作时所表现出的逻辑名辩化的自觉性,还仅仅是笔者的一种猜测。

不过,情况在谭嗣同那里却有很大的不同。1898年,谭嗣同在“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的演讲中,基于“西学中源”的立场,认为近世新理新学,如商学、兵学、农学、工学、交涉,等等,无不萌芽于中国古学。其中,辨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孙龙和惠施。谭氏所谓“辨学”,既不是指辨析不同观点之间的是非同异,也不是指富于才学而又善于辩论,更非日后用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或本土名辩的“辩学”,而是艾约瑟、王国维用以翻译“logic”的“辨学”。公孙龙、惠施是中国古代名辩的代表人物,谭嗣同以为逻辑源自公孙龙和惠施,其实质就是要把作为西学的逻辑本土化、名辩化,“以此见吾圣教之精微博大,为古今中外所不能越;又以见彼此不谋而合者,乃地球之公理,教主之公学问,必大通其隔阂,大破其藩篱,始能取而遗还之中国也。”^①

① 谭嗣同:《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8页。

四、作为名学的 Logic

逻辑的名辨化在严复那里有了更高层次的自觉。不同于艾、王等人以“辨学”译“logic”，严复不仅沿用了“名理”一词，^①而且首创了“逻辑”这一音译名词，但他本人更亲睐的却是“名学”这一意译名词。这可以从他为自己两部逻辑译著所确定的书名略见一斑：其一是1905年金陵金粟斋木刻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②其二是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耶方斯著《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③

那么，严复为什么要舍“逻辑”、“辨学”等译名而独用“名学”？这种译法是否受到了中国古代名辩的影响呢？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复指出：

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精而微之，则吾生最贵之一物亦名逻各斯。……故逻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故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④

这里，严复从英语“logic”的希腊语词源“logos”的“奥衍”，以及逻辑在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上所具有的“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地位，论证了逻辑之为学的“精深广大”。

① 例如：“五旌者，所以区词中所谓之名为何等也。其说始于希腊诸名家，而后人循而用之，以为实具甚深之义，言名理者所不可不求其瞭然者也。”此所谓“五旌”，即《名理探》所译之“五公”，即亚里士多德谓词理论论及的属、种、种差、偶有属性与特有属性；而“名理”，则指逻辑。参见《穆勒名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

② 据考证，近代中国译介穆勒 *A System Of Logic* 一书的第一人并不是严复。1898年，由格致书室刊行的傅兰雅(John Fryer)译《理学须知》，其实就是对该书的一个极简略然而完整的概述。参见陈启伟：《再谈王韬和格致书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载《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第54-57页；熊月之：《晚清逻辑学译介述论》，第153-155页。

③ 《名学浅说》与《辨学启蒙》为同一底本。作为逻辑著作的名称，“名学”一词首见于1902年由东京日新丛编社出版的杨荫杭译《名学》，但严复在1895年的“原强”一文中，已用“名学”来指称西方逻辑：“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参见王弼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④ 《穆勒名学》，第2页。

由此出发,他认为,《名理探》、《辨学启蒙》等以“探”、“辨”释“logic”,“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惟有“名学”一词,方能契合逻辑这门学问的“精深广大”。个中缘由有二:其一,汉语中只有“名”这个字的内涵庶几与“logos”的“奥衍精博”相同;其二,逻辑之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恰如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正是有见于逻辑在科学方法上的基础性地位与正名在学问思辨上的极端重要性这二者之间的相似,严复明确指出:“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①

不难发现,严复在讨论为什么要用“名学”来译“logic”时,明确提到了中国本土的“正名”思想。“正名”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处理名实关系上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要求名实相当,而名实之辩正是中国古代名辩的基本论题之一。先秦名家对名实之辩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尹文提出“以名定形,以形检名”,强调“名不可差”。惠施与其他辩者提出“历物十事”和“辩者二十一事”,阐发了他们对名的辩证认识。公孙龙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并运用于坚白、同异之争的解决和“白马非马”的论证。正是有见于中国古代名辩已经对包括名实之辩的诸多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提出了包括“正名”在内的一系列主张,严复认为,“夫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不然,则所谓坚白同异、短长捭阖之学说,未由立也。孟子七篇,虽间有不坚可破之谈,顾其自谓知言,自白好辨,吾知其于此事深矣。至于战国说士,脱非老于此学,将必无以售其技。盖惟精于名学者,能为明辨以晰;亦惟精于名学者,乃知所以顺非而泽也。”^②

严复用“正名”的重要性来为以“名学”译“logic”的正当性辩护,其实质就是逻辑的名辩化。事实上,像王国维一样,严复也经常借用旧有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诠释西方传统逻辑的基本术语(见下页表)。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严复用“联珠”或“连珠”来译“syllogism”。三段论是由两个包含着共同项的直言命题作为前提而推出另外一个直言命题为结论的推理,一个有效的三段论应该有且仅有三个不同的词项。用严复自己的话来说,三段论是“合三词而成一辨”,“必以三名为三端”。^③至于联珠,则是中国古代名辩常用的一种表述逻辑推理和论证的文体,其历史可以上溯至《韩非子·内外储说》中所包含的数十个论式。据《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引沈约《注制旨连珠表》:“连珠,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如珠之结绡也。”两汉魏晋的班固、扬雄、陆机、葛洪等都曾演连珠或拟连珠,将其作为一种博辩广喻的推理和论证方法。按严复之见:

演联珠见于《文选》,乃一体之骈文。常以“臣闻”起,前一排言物理,后一排据

① 王棫编:《严复集》(第五册),第1247页。据严译,“言名学者深浅精粗虽殊,要皆以正名为始事。”参见《穆勒名学》,第17页。

② 耶方斯:《名学浅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6页。

③ 同上书,第47、43页。

此为推,用“故”字转。其式但作两层,与三词成辨者,实稍殊异。虽然,使学者他日取以审谛,其义意乃与此同。但旧是骈文,语多俳丽,遂生云雾,致质言难见耳。不佞取以译此,无所疑也。^①

此即是说,尽管联珠与三段论有所不同,如前者通常仅分两层,但“语多俳丽”,推理、论证的内容不易把握,后者“三词成辨”,具有明显的推理结构,但二者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均是一个由“原”(前提)而得“委”(结论)的过程。正是基于此,即便二者“实稍殊异”,严复仍主张以“联珠”作为“syllogism”的正式译名,其考量就在于借助中国本土的名辩来翻译与诠释西方传统逻辑的术语,能够使后者更容易地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所接受。

英语	严氏译名	现译名	名辩词源
logic	名学	逻辑	名
name	名	名词	
concept	意	概念	意
proposition	词	命题	辞
inference	推知/证悟/ 推证/推证参伍	推论	推
reasoning	思辨/思籀/思议	推理	辨
the science of reasoning	思辨/思议之学	推理科学	
argument	难/辨	论证	
syllogism	连珠/联珠	三段论	联珠/联珠
making classifications with genera and species	类族辨物	区别属种	类/辨
to reason from like to like	以类为推	基于相似性的推理	类/推
names of classes of things	类物之名	类名	类/名
reasoning by analogy	比拟	类比推理	拟
discovery by agreement	类异见同	求同法	类

对于严复这种以名辩释逻辑的努力,梁启超是有所见的。1902年,他就曾指出:“按英语 Logic,日本译之为‘论理学’,中国旧译‘辨学’。侯官严氏以其近于战国坚白同异之言,译为‘名学’。”^②在1904年,当论及“logic”一词的不同译名时,梁氏又强

^① 耶方斯:《名学浅说》,第43页。

^② 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十三,第3页。

调:“Logic 之原语,前明李之藻译为名理。近侯官严氏译为名学,此实用九流‘名家’之旧名。”^① 尽管不赞同严复以“名学”译“logic”,但梁启超准确地揭示了“名学”一词实际上来源于作为先秦至汉初重要学术派别之一的“名家”,因为在严复看来,逻辑之为学与名家对坚白、同异之争的辩论与研究颇为相近。而把作为西学一部分的逻辑纳入先秦名家之所争所思的框架之中,称其为“名学”,其实质正是逻辑的名辩化。^②

在严复以“名学”译“logic”的影响下,不少逻辑译著或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逻辑著作、教科书被冠以“名学”之名出版。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名学释例》、《名学稽古》、《中国名学考略》、《名学纲要》、《名学通论》、《名学要义》和《中国名学》,等等。^③

五、对“逻辑名辩化”的质疑

如果说以“辨学”、“名学”等来翻译“logic”代表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逻辑名辩化的努力,那么不能回避的是这种努力在当时就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而这些质疑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逻辑名辩化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在逻辑东渐的过程中,有不少学者主张用日本学人创制的“logic”的汉字译名“论理学”来称呼逻辑。^④ 1902年10月,汪荣宝译高山林次郎的《论理学》上卷发表,这可能是第一本以“论理学”为书名的汉译逻辑著作。^⑤ 在出版于1906年的大西祝所著《论理学》中,译者胡茂如指出:

① 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载《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七,第55页。

② 据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就像后来的胡适,严复完全了解古代‘逻辑学家’即名家(the School of Names)公孙龙、惠施等人的名学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毫无疑问,他把‘logic’译为‘名学’就是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一种暗示(allusion)。不过,严复并没有详尽地叙述他们的成就。”参见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69; 亦可参见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③ 陈文编译:《名学释例》,上海:科学会编译部1910年版;章行严、胡适、陈启天:《名学稽古》,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齐树楷:《中国名学考略》,北平:四存学会出版部1923年版;屠孝实:《名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陈显文:《名学通论》,上海:中华报社1925年版;萧宗训译:《名学要义》(*The Essential of Logic by Bernard Bosanquet*),上海:大东书局1925年版;虞愚:《中国名学》,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版。

④ 关于“logic”一词的不同日制汉字译名以及“论理”一名的确立过程,可参见最长顺:《近代日本学名“论理”之厘定》,载《人文论丛》2005年卷,第98-106页。

⑤ 载《译书汇编》,1902年,第二年第7期,第1-59页。中国逻辑史学界通常认为,190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田吴焯译十时著《论理学纲要》,第一次把“logic”译为“论理学”。参见词目“论理学”,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不过,这一说法有两点与事实不合:第一,该书的实际出版时间应为1903年。参见《〈论理学纲要〉出版说明》,载十时弥:《论理学纲要》,田吴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页。第二,先于《论理学纲要》,汪译《论理学》以及梁启超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1902年)、林祖同译清野勉著《论理学达旨》(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版)等,都提及了“论理学”这一“logic”的日制汉字译名。

论理学于西语为牢辑科,东邦学者译以今名。其所究明者,则言论之理也。……言以名而成,名与名相与之际,言论之理存焉。深究其理而以之自证,以之察天下之言。……是著自亚氏以来之演绎论理与近世新派之归纳法,皆有以论述而阐明之。……又取印度之因明,比较参伍以求之。天下之论理学,盖毕罗于是。^①

按胡氏之见,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已穷尽了“天下之论理学”的外延,由此中国本土的名辩也就被排除在了论理学亦即逻辑之外。胡茂如的这一观点很可能受到了原作者大西祝的影响,后者认为:“泰西论理学之端,渊自希腊,而亚理斯多德为之魁。亚洲则惟印度古代所构成者之因明足以当之。世界人民之与于斯学者,盖不能求诸印度、希腊人之外。虽间有之,皆导源于二土之人者也。”^②

其实先于胡茂如所译《论理学》,朱执信在1905年就主张:“中国之人,自来无有论理学。(坚白之论,实不与论理学同物,特论理之应用而已。)”^③既然以坚白之论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名辩与逻辑并不同类,那么借助“逻辑名辩化”这一译介策略来普及和研究传统逻辑的可行性与成效就难免引起人们的怀疑。事实上,对“逻辑名辩化”的质疑首先就表现为质疑“名学”是“logic”一词的合适译名。严复本人并不认为“论理学”是一个好的译名,但他并没有为此提供理由,而只是在《名学浅说》的一则按语中说:“日本谓名学为论理学,已极浅陋,……不可以东学通用而从之也。”^④反过来,主张用“论理学”取代“名学”的学者倒是进行了颇为充分的讨论。早在1904年,梁启超就认为,严复从名辩去理解逻辑,以源于先秦名家的“名学”一词译“logic”,“惟于原语意,似有所未尽。今从东译通行语,作论理学。”^⑤对于“名学”为何未能完全表达出“logic”一词的语义,张君勱在1907年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夫为推论之器与其目的者,固名焉,然而论理之所恃,不独在名。前乎此者,犹有思想公例之大部分,固此学之所赖以成科者也。后乎此者,犹有智识之理论问题Theory of Knowledge,即近世所称实质论理学者,愈非此名之所能涵概矣。若是乎,名学一名,去此学之范围不已远乎!

① 胡茂如:《序》,载大西祝:《论理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年版,第3页。此序原署名为“李鸣阳”,据该书第三版谷钟秀序:“李序,即其自为而以李名之者。”

② 大西祝:《论理学》,第2-3页。

③ 朱执信(县解):“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民报》,1905年,第6号,第65页。

④ 耶方斯:《名学浅说》,第43页。

⑤ 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第55页。

日人“论理”二字,……其意言推论之理法、言论之理法,盖即取此学之界说,而为其学之名,故颇足以概此学之全。所不足者,其名与界说中字眼常相覆叠,不免犯论理学中界说定例。严氏定名,素雅驯概括,独此一名,则日人所定,似有一日之长,故今用之。^①

这就是说,“名”(名词/概念)固然是推理、论证所凭借的工具,但并非唯一的工具;而逻辑除了要研究“名”,还要研究“思想公例”(推理、论证的规则与规律),甚至是知识论的一些问题,因此“名学”一词并不足以指称逻辑的全部研究对象。相反,“论理”一词意指“推论之理法、言论之理法”,则能涵盖逻辑的全部内容。^②

尽管如张君劢所指出的,“论理”之名与其定义之间容易相互包含,导致循环定义或同语反复,但在近代中国,冠以“论理学”之名的逻辑译著、著作和教科书,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名学”或“辨学”命名的出版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世纪40年代末,前者有近60种之多,而后者则不超过10种。^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基于逻辑的名辨化来用“名学”、“辨学”之名对西方传统逻辑进行译介、普及和研究,似乎并没有得到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学者和出版机构的广泛认同。

对于以“辨学”或“名学”来译“logic”,章士钊也提出了质疑。尽管严复是创制“逻辑”这一音译名词的第一人,但他本人并不主张将其作为学科的正式名称。在发表于1910年的“论翻译名义”一文中,章士钊就力主“逻辑”作为正式的译名。对于严复主张“取吾国旧文而厘定”西语译名,^④章氏以为,“欲于国文中觅取一二字,与原文意译之范围同其广狭,乃属不可能之事。”^⑤例如,以源于先秦名家的“名学”来称呼逻辑,或可涵盖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却难以涵盖培根以后的逻辑。这是因为“古之名学,起于名物象数之故,范围有定,虽名家如尹文、公孙龙、惠施之徒,其所为偶与今之逻辑合辙,其广狭浅深,相去弥远。”^⑥至于把“logic”译为“辨学”^⑦,在章士钊看来:

① 张君劢(张立斋):《耶方思氏论理学》,载《学报》,1907年第1期,转引自熊月之:《晚清逻辑学译介述论》,第151页。

② 1919年,孙中山指出,无论是把“logic”译为“名学”还是“辨学”,抑或是“论理学”,都犯有以偏概全的错误。在他看来,“凡稍涉猎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人类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而中国则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参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载《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③ 此数据来源于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http://opac.nlc.gov.cn/F?RN=932191852>)所进行的检索。检索条件为正题名:“名学”、“辨学”、“辩学”和“论理学”(正题名);时间:2011年8月12日。

④ 参见《名学浅说》,第41页。

⑤ 章士钊:《论翻译名义》,载《章士钊全集》(第一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

⑥ 章士钊:《逻辑指要》,重庆:时代精神社1943年版,第1页。

⑦ “其实‘辩’即‘辨’本字,二者无甚择别。”参见章士钊:《逻辑指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页。

吾国夙分名、墨为两家。……以愚思之,通括名墨而无所于滞,惟“辩”字耳。……然“辩”虽能范围吾国形名诸家,究之吾形名之实质,与西方逻辑有殊。今以其为同类也,谓彼即此,几何不中于《淮南》谓狐狸之讥。……故通常译名不正,其弊止于不正。而以“辩”或“名”直诹“逻辑”,则尚有变乱事实之嫌。^①

这就是说,以“辩学”译“logic”,如同用“名学”称呼逻辑一样,都是基于一个错误的预设,即中国旧有之辩学、名学,或者说名辩,与西方逻辑同类,具有本质的同一性。而据章氏之见,名辩与逻辑虽偶有合辙,但本质不同,因此用本土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诠释西方传统逻辑的术语,也就是说,逻辑的名辩化,势必妨碍对于传统逻辑的学科性质和理论内容的准确把握,从而最终不利于传统逻辑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和研究。

章士钊主张以“逻辑”音译“logic”的理据无疑还有可以商榷之处,^②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逻辑”一词逐渐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世纪40年代末,被冠以“逻辑”之名出版的译著、著作和教材已超过60种。^③在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逻辑著作和教材中,较有影响的有《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综合逻辑》、《逻辑》、《逻辑与逻辑学》、《逻辑典范》、《逻辑学讲话》和《逻辑要义》,等等。^④1949年之后,“逻辑”最终作为正式的学科名称被确定下来,沿用至今。

六、进一步的讨论

行文至此,笔者以为在逻辑东渐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逻辑名辩化”的阶段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客观上讲,以《辨学》、《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等西方逻辑译著为代表,逻辑的名辩化对于在近代中国普及和研究传统逻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诚如

① 章士钊:《逻辑指要》,重庆:时代精神社1943年版,第3-4页。

② 对“logic”译名之争更为详细的述评,可参见董志铁:《关于“逻辑”译名的译名及论战》,载《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第25-28页;顾有信:《语言接触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逻辑”中文译名源流再探讨》,邹嘉彦、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194页。

③ 此数据来源于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http://opac.nlc.gov.cn/F?RN=932191852>)所进行的检索。检索条件为正题名:“逻辑”;时间:2011年8月12日。

④ 汪奠基:《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937年版;林仲达:《综合逻辑》,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金岳霖:《逻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牟宗三:《逻辑典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殷福生(殷海光):《逻辑学讲话》,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谢幼伟:《逻辑要义》,上海:华夏图书出版公司1948年版。

郭湛波所指出的,“自明末李之藻译《名理探》,为论理学输入中国之始。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不过没有什么发展。一直到了严几道先生,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形式论理学始盛行于中国,各大学有论理学一课。”^①正是有见于这些译著在近代中国逻辑东渐过程中的重要性影响力,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被收入《逻辑丛刊》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而严译两书在1981年还作为《严译名著丛刊》的一部分由商务印书馆重印。

更为重要的是,逻辑的名辩化还刺激了对中国旧有名辩的研究。在近代以前,名辩长期为经学所忽视,仅仅是在明末清初随着诸子学的兴起才引起了一些关注。历史地看,对名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孙诒让和梁启超。1897年,孙诒让致信梁启超,认为自己的《墨子间诂》对《墨辩》诸篇的诠释尚有遗憾:

《经》《说》诸篇,闾谊眇悒,所未窥者尚多。尝谓《墨经》揭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②

此所谓“近译西书”,应当就是艾约瑟译的《辨学启蒙》一书。梁启超从孙诒让的来信获得灵感,于1904年发表“墨子之论理学”一文,认为“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详,今引而释之,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焉。”^③

孙、梁二人论及的《墨辩》研究方法,其实质就是用表述“大义”的西方逻辑(以及印度因明)的术语来阐发《墨辩》中的“微言”,在《墨辩》用语与传统逻辑的术语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以此证成《墨辩》在义理上与传统逻辑的一致性。经过胡适、伍非百、章士钊、谭戒甫、侯外庐、詹剑峰、沈有鼎、汪奠基、陈孟麟、周文英等一大批学者的加盟与推动,孙诒让和梁启超所倡导与实践的这种“以(逻辑)新知附益(名辩)旧学”的方法,逐渐从《墨辩》研究扩展到了对整个古代名辩的研究,相应地,“名辩逻辑化”(the logicization of Mingbian)也就成为了百余年来名辩研究的主导范式。^④

尽管逻辑名辩化的历史功绩不容否认,但是“辨学”、“名学”等译名最终为“逻辑”所取代,已经预示着逻辑的名辩化——用本土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诠释西方

①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② 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载方授楚:《墨学源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19页。

③ 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载《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七,第56页。

④ 笔者曾借用“据西释中”的提法对名辩逻辑化的实质与双重后果有所分析,参见晋荣东:《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191页。

逻辑的术语,以利于后者的普及和研究——难以挽回其在总体上失败的命运。大约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传统逻辑以及逻辑的其他分支的研究与普及,逐渐走上了一条摆脱古代名辩的影响而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现在通行的逻辑术语几乎不出自古代名辩的语汇,即便是在逻辑名辩化阶段所使用的一些具有名辩词源的逻辑译名,绝大多数也已经被弃而不用。^①

第二,除了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后来的中国学者在进行逻辑研究时并不需要以掌握本土名辩的语汇和理论为前提。

从表面上看,逻辑名辩化的失败,似应直接归因于中国古代的名辩未能提供足够数量的合适语词来翻译西方逻辑的术语,而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对旧有名辩的整理与研究在近代中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笔者以为,在更深的层次上,逻辑名辩化未能完全成功的原因应该从(传统)逻辑和名辩各自的学科性质或者理论内容中寻找。如前所述,质疑“辨学”、“名学”等是“logic”一词合适译名的学者,亦即自觉或不自觉地质疑逻辑名辩化的学者,或者认为这些渊源于古代名辩的语词不足以涵盖传统逻辑的全部内容,或者强调本土名辩与传统逻辑根本就不同类。就逻辑名辩化在事实上已经失败而言,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代的名辩与由西方输入的传统逻辑并不完全等同。然而吊诡的是,作为百年名辩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主导范式,“名辩逻辑化”的基本预设恰恰就是:“在中国特殊的古代思想史上,名辩即是逻辑,二者是实质上的同义语。”^②也就是说,如果不运用传统逻辑(以及逻辑的其他分支)的术语、理论和方法,名辩的本质、内容和历史地位就无法得到澄清、揭示和勘定。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逻辑东渐过程中的“逻辑名辩化”与百余年来名辩研究中的“名辩逻辑化”其实是牵连在一起的,对二者在理论上的成败得失的评价,均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名辩与逻辑的关系问题。^③不过,这已经是另一篇论文的主题了。

(责任编辑:肖志珂)

① 参见陈振明:《西方逻辑传入初期汉译作品中英汉词语对照表》,载温公颐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8-449 页。

② 赵纪彬(纪玄冰):《名辩与逻辑》,载《新中华》1949 年第 12 卷第 4 期,第 29 页。

③ 顾有信已经意识到,“logic”一词的不同汉译名,如“辨学”、“名学”、“名辩学”、“论理学”以及“逻辑”等等,尽管都指称逻辑,但不应该简单地全部反转回译为“logic”,因为这样会使这些汉语名词的意义遭到误判漏读。参见顾有信:《语言接触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逻辑”中文译名源流再探讨》,第 184 页。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 Power, Trust, and Risk: Some Reflections on an Absent Issue

Harald Grimen

Abstract: In modern discussions among health professionals there is a strange lack of discussions of power. This is most notably true for the discussions about proper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 and the discussions about trust. This article explores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absence. It is argued that the absence of the issue of power hampers a serious and open moral discussion of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forms in the health care system. It is also argued that some of the proposals for how to organize physician–patient interaction are rather unrealistic, mainly because the issue of power is neglected. Finally, the article develops some ideas about how power ought to be approached in modern health care.

Key words: physicians; patients; power; trust; risk

• Solipsistic and Symbiotic: Intersubjective Idea of Neo–phenomenology

PANG Xue–quan, FENG Fang

Abstract: The critique of solipsism and intersubjectivity is one of the heated topics of 20th Western philosophy. By discussing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Wittgenstein’s attack on solipsism has greatly impacted discussions later on; Husserl was the first one who put forward the problem of intersubjectivity and believed that he had solved it with the 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ness and empirical reconstruction; Heidegger,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as well had their own approaches to this problem. To new phenomenologist Hermann Schmitz, solipsism can neither be avoided nor proved meaningless, the tension between solipsism and intersubjectivity is well established in bodily communication (*leibliche Kommunikation*) and situation in new phenomenological sense.

Key words: solipsism; intersubjectivity; phenomenology; new phenomenology

• Re–criticism on the Objective Information Field in Information Philosophy

HUO You–guang

Abstract: Prof. Wu–kun, establishes “objective information” with the case of “moon in the water” in his *Information Philosophy*.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we can find that “objective information” confu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terials image and materials noumenon; objective information can not evolve or degenerate, it does not exist in relation with a whole and a part between objectiv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noumenon. Therefore, objective information can’t save the all–round information about materials noumenon. The objective information can not be established, neither ca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information philosophy; objective information; Pro. Wu–kun

• The “Mingbianization” of Western Logic and Its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JIN Rong–dong

Abstract: When European Jesuits and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import traditional logic from western culture, they tried to translate and interpret logical terminology in terms of the words and theory of ancient Chinese *Mingbian* or study of names and argumentation so that western logic could be easily accepted by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culture. To a great extent, the “mingbianization” of western

logic did popularize traditional logic and stimulate the study of *Mingbian* in modern China, but generally speaking it did not succeed. The reasons for its failure are extremely valuable to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logic and *Mingbian* as well as the reflection on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logicization of *Mingbian*.

Key words: logic; *Mingbian* (the study of names and argument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 Heidegger's Immanent Critique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LIANG Jia-rong

Abstract: In the "Preliminary Part" of the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Heidegger offers a concis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enomenology up to the time of this lecture. He proposes an immanent critique of phenomenology in the third chapter of this part, in which he analyzes four of Husserl's determinations of pure consciousness and argues that they are not determinations of the entity in itself with regard to its being. Indeed, Heidegger misunderstood Husserl in some points and neglected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of Husserl's argument. But, contrary to Klaus Held's opin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Heidegger's critique is not unjustified and not without phenomenological ground.

Key words: Heidegger; Husserl; phenomenology; consciousness; being; immanent critique

• The Moral Basis of Liberal Justice Theory

GU Su

Abstract: Whether there is a moral basis for liberal justice theory, is a key issue hotly debated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J. Rawls emphasizes his theory of justice as "free-standing" while debating with J. Habermas, which means that its justification does not rely on comprehensive moral or religious doctrines,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no moral basis. 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 and public reason are theoretical bases for justice, and respecting humans, taking human as end is its core moral basis, on which peopl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form, develop and obey their overlapping consensus. It transcends concrete moral and religious beliefs, and constitutes universal and essential rules. Only when people obey supreme moral principles, and people's sovereignty is prescribed as the universal obligation, i.e., concerning and respecting humans, can it be understood as embodies rational consensus, form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becomes rules obeyed by all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ory of justice; political liberalism; moral basis; J. Rawls; J. Habermas

• Reading Leader's Minds: In Search of the Canon of 21st Century Global Capitalism

Christopher Michaelso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books to explore the values and practices of capitalism and to speculate about how they might evolve as 21st century global capitalism comes into being. The values embodied by the Westernized canon we have inherited might account for certain shortcomings of capitalism. As economic power shifts away from dominant markets of the recent past, our search for the canon of 21st century global capitalism can help to shape the values we aspire for our capitalism of the future to embody and to enable.

Key words: business ethic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ritical theory; economics; emerging marke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